

卢曼社会系统论中的媒介观简介^①

□ (日本) 樱井芳生 李卓钧 译

现代文化科学的最高峰——卢曼^②

日本文化有个奇怪的平等主义，“能干的”和“不能干的”没有多少区别。但是，“学术”的世界可不是这样，很“残酷”，只有极少数人担当得起更新知识的最前沿的荣誉。

关于社会系统论的书有不少，但为了大家容易理解，如果夸张一点，可以简单地说：卢曼以外的社会系统论的书，没有必要读。（不过，只有沃勒斯坦^③的《世界系统论》是个例外，请各位务必一读。）这是因为我们通常不必去理会小人物，而对正宗的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倒要碰一碰。

在大学时代，希望大家务必读读卢曼的著作。不过，事先声明，各位如果没有预备知识就去读卢曼的书，一定会有挫折感。卢曼的著作完全像“经书”一样，各种未曾听过的概念像洪水一样涌来，即使读完了，你也可能觉得完全不知道写了些什么。所以，我常常不揣浅陋，就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给各位作个引导。

关于“系统”的概念

说到社会系统论，“系统”的概念当然是最基本的。卢曼认为的“系统”是什么呢？

可以将“系统”定义为：与系统的外部（=环境）相比，相对而言，一是构成要素的东西被缩减，二是诸要素间的关系也被缩减，这样的领域称为系统（或系统的内部）。

上述定义并非完全忠实于卢曼的原话，但这样定义是最容易理解的。

这个定义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以它自身来做界定，而是通过与系统的“外部”作对比来界定。卢曼把“系统的外部”叫做“环境”，而且认为自己系统论的创新之处正是以这个“系统与环境的图式”为依据。

如果仅有以上所言，大概什么也没说清楚。下面，稍稍牺牲一点严谨性，举个通俗的例子来说明。

例：副教授与女大学生“被禁止的关系”

我们在日本这个全体的集合中，构筑一个“鹿儿岛大学”的系统。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的要素是“大学的成员（学生和教员）”，于是，上述系统定义的第一个要件被满足了。即：不是每一个日本国民都可以成为鹿儿岛大学的“要素”（学生和教员）。在这里，日本国民被“缩

减”，只有一部分人成为系统的“要素”（鹿儿岛大学的成员）。

以上所说的是要素的缩减，不仅如此，“关系”也被缩减了。

例如，如果是日本国民，无论是谁，都可以将约会的“他人”当作“性伙伴”。但是，在“鹿儿岛大学”内部，是不允许“副教授”把“女大学生”当“性伙伴”的。于是，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的外部（环境）可以成立的关系（性伙伴），在鹿儿岛大学系统（的内部）就不能成立了。也就是说，“与环境相比，相对而言，前述二之诸要素间的关系也被缩减了”。

复杂性的缩减

我们用具体的数值来试着把握系统是如何缩减“要素”和“关系”的。

在上述例子中，假如日本国民的总人数是“10人”（只是为了计算方便，当然说一亿人也是同样的道理），这全部10人都可以将所有其他人当作“性伙伴”，这样，能够成立的关系数是：

$$10 \times 9 = 90 (\text{种})$$

即：日本作为“环境”的关系数，可以看作是90种。我们也可以说日本这个“环境”的“复杂性”是90种。卢曼所说的“复杂性”，就是“能够成为关系的种数”。

就复杂性来说，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里，首先是要素被缩减了，即全部10个日本国民不能全部成为鹿儿岛大学系统的“要素（成员）”，假定只有其中4人能成为鹿儿岛大学的要素。如果这4人都可以自由地成为别人的“性伙伴”，可以产生的关系数就是

$$4 \times 3 = 12 (\text{种})$$

可以说，由于要素的缩减，“复杂性”由90种缩减到12种。

“关系”方面的复杂性也在缩减。

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系统中，成员分为“教员”和“学生”两部分，教员不允许将学生当性伙伴，学生也不允许把教员当性伙伴。于是，因为教员和学生各为2人，所能成立的“性伙伴”这种关系的数量就是

$$4 \times 1 = 4 (\text{种}) (\text{因为性伙伴仅限于与自己相同身份者，能成为对象的只有1人})。$$

这样，从“环境”到“系统”，不论是要素还是关系，都被缩减了，“复杂性”也从“90种（环境的复杂性）”缩减到“4种（系统的复杂性）”。

卢曼将此称之为“系统带来的复杂性缩减”。

社会系统 = 交流（传播）系统

以上，为了直观和易懂，举了“副教授与女大学生被禁止的关系”这个例子。但实际上，这个例子是不太严密和准确的。在上例中，鹿儿岛大学系统的要素是“成员”，即人。但是，实际上在卢曼的社会系统论中，社会系统的“要素”不是“人”，而是“交流（传播）”。

对“交流（传播）”不要做狭义的理解，卢曼所说的“交流（传播）”，简单地讲，就是“世上人与人之间全部‘交往’行为”。就是说，通常所说的“行动”、“举止”、“言行”等等，都是卢曼所说的“交流（传播）”，即：重复的、人们之间的“交往”，都是“交流（传播）”。

因此，卢曼的“社会系统”可作如下定义：

当将要素替换为“交流（传播）或交往”后，与系统外部（=环境）相比，相对而言，一是能成为要素的东西被缩减了，二是诸要素间的关系被缩减了，这样的领域就叫“社会系统”。

以鹿儿岛大学社会系统为例

我们再一次以鹿儿岛大学为例来进行考察。

首先将社会系统的要素替换为“交流、传播、交往”。因此,作为替换的要素,就包含了“当性伙伴”。但是,在鹿儿岛大学这个“社会系统”里,“能成为要素的东西被缩减了”,因此,在鹿儿岛大学这个“正派的大学”里,在大学内部,禁止“性伙伴”这种“交流”或者“交往”,只允许“教育”与“学习”这种“交流”或者“交往”。

这是定义所说的“要素的缩减”。

接着考察第二个要件“关系的缩减”。

说到交流(传播)这个要素相互的“关系”,具体来说,可以看成这样一幅图景:“交流(传播)”与“交流(传播)”相互“接续”,就是说,一个“交流(传播)”(要素)连接上另一个“交流(传播)”。

更具体地说:在鹿儿岛大学这个“社会系统”里,对于来自教员方面的“教育”的交流(传播)这个要素来说,期待着来自学生方面的“学习”的交流(传播)这个要素的接续。教员方面,进行“教育”的传播,但是学生却以“年终送礼”的交流相接续,进而教员对此以“送学分”之类的交往相接续,这应该是不允许的。

缩减的关键是“含义”

在以上所说的以“交流”作为要素的社会系统中,“复杂性缩减”是如何进行的呢?其中最关键的东西是“含义”。

何谓“含义”?所谓“含义”,简单地说,就是“把某个事物 A 看做某个事物 B”。

某个副教授和某个女大学生谈话。在生活中,我们通常把这个谈话 A 看做某个事物 B。因此,这个谈话 A 既可以看做“B1:教育性的谈话”,也可以看做“B2:求爱的谈话(当性伙伴)”。在上述的“社会系统”里,交流(即系统的要素)和交流的接续(即要素的关系)在缩减时,真正起作用的就是这个“含义”。即:这个谈话 A,可能是“B1:教育性的谈话”,也可能是“B2:求爱”,也可能是“B3:纯粹是嘴巴的活动”……但正是将它当做“教育性的谈话”来看待,其他的“诸种可能性”就被“缩减”了。

这样,在一个“社会系统”内部,各种“交往或交流、传播”由于“视为某某”的“附加含义”的行为,各种可能性(复杂性)就被缩减了。就此而言,所谓“社会系统”,是用“含义”这种机制缩减了“复杂性”的系统。换言之,“社会系统”也可以说成是“含义系统”。

保存性的否定:含义的功能

如上所说,“含义”这个机制使得不能把谈话 A 看做 B2、B3……,只有看做 B1 才是正确的。在这里,有一点应该加以注意:在以上说明中说到,“不是 B2、B3……,看做 B1 才是正确的”,这是说在这里 B2、B3……的可能性确实是被否定了,但应该注意的是,B2、B3……的可能性被否定了,但不能说它们已经“完全不存在”了。

副教授的谈话 A 是被女大学生(或者第三者、或者副教授本人)附加上“B1:教育性的谈话”的含义的,但是社会上常有“意外”之事,虽然附加上“B1:教育性的谈话”的含义,但后续的“交流或者交往”不能有效地接续的事情也是常有的。那时,刚刚被否定的“B2、B3……”以下的“其他含义的可能性”就可以“复活”了。

“啊,那个谈话 A 我还以为是‘教育性谈话’,其实是在‘求爱’吧?”

也就是说,所谓“含义”,是从“B1、B2、B3……”的多种可能性中选择一项(如教育性的谈话),从而“缩减了复杂性”,但期待(因而附加含义)一旦落空,就会使“别的含义的可能性”复活,使再一次“附加含义”的工作成为可能。如此说来,表面上,“含义”否定了其他的诸种可能性(B2、B3……),但实际上可以说是“保存性”的否定。

传言游戏问题

但是这种“便利有效”的含义机制惹出了新问题。那就是“传言游戏”问题。

传言游戏各位大概做小学生的时候都玩过吧?把人分成几组,传一段话,从各组的第一个人依次传下去,最后,第一个人的话和末尾人的话最接近的一方获胜。玩过这个游戏的人谁都知道,人们之间的“传言”是靠不住的,当初的话传下去就完全变样了。

上述的“含义”机制也是同样的。

前面说过,在确定“含义”时,“被别样解释的可能性在被否定的同时也被保存下来”,因此,被附加“含义”的交流(传播)在接续下去的过程中,会有与当初完全不同的“含义”的交流(传播)存在的可能性。

例如,在鹿儿岛大学这个社会系统里,当初,只能有“学术性的交流(传播)”可以流通(即接续),但是,由于“含义”不能排除“附加别样含义的可能性”,所以,这个“学术性的交流”不知何时就有可能变成了“附加有求爱意思的交流(传播)”。换言之,当初作为“学问之地”的鹿儿岛大学这个“社会系统”,不知何时就可能变成“性伙伴的圈子”。

这就是所谓的“传言游戏”问题。

确保交流(传播)接续的是媒介

因此,需要有一种机制,以对抗交流(传播)被附加别样含义的危险,使一个社会系统保持自身的一贯性(卢曼称此为系统的“再生产”)。

(如果严密地讲,或者站在第三者的角度讲,一个社会系统没有什么必要保持自身的一贯性。鹿儿岛大学变成“性伙伴的圈子”也没有什么特别不好。但是,在现实中的系统事实上是要保持自己的一贯性的,如果是这样,就一定要有一种机制。)

这种为了对抗“交流(传播)被曲解、不能确保交流(传播)的接续”的危险性的机制,就是卢曼所说的“交流(传播)媒介”。

作为媒介的“爱、真理、货币、权力”

卢曼对“媒介”的定义是:使交流(传播)的接续得以确保的东西。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说,那和通常所说的“媒介是交流的中介”的定义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。实际上,卢曼的媒介定义可以说只是将通常的定义直白地延长了。但是,它所归结的含义不可小看。因为卢曼将“真理、权力、爱、货币”等作为“媒介”的典型提出来;这是这种定义的特点。

直观地讲,“科学”这种社会系统是以“真理”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(传播)的接续的;“政治”这种社会系统是以“权力”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(传播)的接续的;“家庭”这种社会系统是以“爱”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(传播)的接续的;“经济”这种社会系统是以“货币”作为媒介来确保交流(传播)的接续的。

在“科学”系统中“真理”作为媒介

简而言之,卢曼所说的“媒介”,是一个社会系统中交流(传播)得以流通(即接续)的“干线”(国道或者高速公路)。就是说,在一个社会系统内部,有多种交流或者交往在流通(接续),但在“交流(传播)流通”之际,有一条“最希望通达到那里”的通道,那就是卢曼所说的“交流(传播)媒介”。

例如,在“科学”的社会系统里,实际上也是有多种交流(传播)在流通着,科学工作者向科学工作者求爱是家常便饭的事情。但是,作为“原则”,在科学这个社会系统中,交流(传播)应该是通过“真理”这个渠道(即媒介)流通的。因此,科学这个社会系统就整体而言,是回避“求爱的交流(传播)”的。(不过,实际上,就个别而言,“求爱”的交流也是存在的。)

二元化编码

卢曼指出,这样的媒介有一个特征,叫做“二元化编码”。下面加以说明:

例如,科学系统以真理为媒介,在那里流通的传播都是以“真/伪”这样的“二元性”的标准来进行评价的,因此,该领域的交流(传播、交往)皆围绕着阐发“真理”而进行,这成为该领域同事们的共识。科学系统(而不是性伙伴的圈子)正是作为围绕真理的交流而形成的群体得以保持自身的。

在卢曼所说的“媒介”上,交流(传播)被赋予“更加希望的/更加不希望的”这样两个相反的值流通着,卢曼将此称之为“在媒介上,交流被‘二元化编码’。”

在上述“科学”的社会系统中,“真理”作为媒介,以“真/伪”的标准对交流(传播)进行二元化编码;在“政治”的社会系统中,“权力”作为媒介,以“命令/不命令”(或者“服从/不服从”)的标准对交流(传播)进行二元化编码;在“家庭”的社会系统中,“爱”作为媒介,以“爱/无爱”的标准对交流(传播)进行二元化编码;在“经济”的社会系统中,“货币”作为媒介,以“卖/不卖”(或者“买/不买”)的标准对交流(传播)进行二元化编码。

这个菜,太难吃了

因此,在一个社会系统中,其中的交流(传播)总是用与该系统相对应的媒介进行“解读”的。比如,我在家里吃着太太做得饭菜,我觉得那个菜做得太难吃了,如果对妻子直话直说:“这个菜,太难吃了”,将会怎样呢?妻子会不会也尝一口菜,然后说:“真的,这个菜太难吃了,你说太难吃确实是‘真理’呀”?这无论如何都是不会的。她什么也不会说,只在心里不满地想:我的丈夫是不是不爱我了?

在“科学”系统里,“说真话”的交流(传播)是人们所期待的,但是在“家庭”系统里,“说真话”的交流会被“误读”,在这里,往往是以“爱”为媒介(用“爱/不爱”作二元化编码)来进行解读的。

卢曼理论的意义

以上简略介绍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。

很多读者对卢曼的理论感到莫名其妙,会觉得:“相当意外,非常有趣;既像是常识,又过于抽象;各种观点如洪水般的涌来,令人眼花缭乱。他到底想说些什么呢?”

换句话说,如此“抽象的、难于理解的”卢曼理论到底有什么意义呢?

实际上,对于“卢曼理论的意义是什么”是不可能作很充分的回答的。所谓“科学的最前沿”就是如此。谁懂得山?谁知道海?更不用说人间事。仁者见仁,智者见智,七嘴八舌,众说纷纭。最前沿的科学工作者对于自己的研究方向,全然不能保证取得胜利的果实,而只能判断它“一定是会有成就的方向”,并作“所希望的观测”,如此而已。因此,学术上的尝试的意义,为我们所充分了解的只是:当尝试快要结束了,才知道它还不是科学的“最前沿”。

不过,读者还是想知道卢曼理论的意义到底是什么。以下所言,并不充分,仅就我所理解的,试做一述。

意料之外的东西,其功能具有等价性

卢曼理论的第一个认识所得,是指出了“意料之外的东西,相互之间,功能具有等价性”。说明一下:

通常,我们认为“爱”、“真理”、“货币”、“权力”等事物“既像又不像,是完全不同的东西”,但是,卢曼指出:爱、真理、货币、权力实际上在社会系统中担负着相似的功能:即保证“交流的接续”。这种担当相似功能的现象被称为“等价功能性”或者“功能的等价性”。

卢曼理论的第一个认识所得,就是这样让我们看到了“乍一见完全不同的东西,相互之间功能却是等价的”。

从“必然性”的世界观走向“偶然性”的世界观

卢曼理论的第二个认识所得,就是对我们近代以来潜意识里的作为认识前提的“必然性世界观”发出疑问,而教给我们“偶然性世界观”。

如前所述,在卢曼理论中,说到“含义存在其他解释的可能性”、说到“期待与期待会落空”。就是说,“其他的可能性”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,这种“其他的可能性”就叫做“偶然性”。即“不是不可能,但不是必然的”。

我们现代人通常不这样考虑问题。对方(B)一秒钟以后会干什么,他已经“必然性”的决定了;但我(A)不是神,只是不能预测他下一秒钟会干什么而已。但我们现代人却常常并没意识到这一点,就以为会预测,并以此为前提而行动。

但是卢曼不这样,他完全是“逆向思维”。世上发生的事情,实际上哪一件不是“偶然性的”?而且,各种各样的社会现象,都只是某一局部的现象,怎么就会认为它具有“完全必然的可能性”呢?

一个大学的副教授,人们期待着他在上课时间里开始讲课,但是,他没有讲课的必然性。只是因为在一个“社会系统”里,有“媒介”的机制,将“其他的可能性缩减了”,于是就觉得讲课是“必然”的。但是,实际上他有在上课时间里“开始吹口琴的可能性”。

交流(传播)概念的一般化

卢曼理论的第三个认识所得,是将交流(传播)概念的一般化,与此相伴随的是将媒介概念的一般化。

我们通常把交流(传播)看做“信息的传递”,把媒介看做“报纸、电视等等”,这都是对的。但是,卢曼在定义“交流(传播)”、“媒介”时,将其定义在一般性上展开来,扩张了这些概念。例如,通常“年终送礼”不被认为是传播,而对卢曼来说,这是一种很出色的传播。

报纸越发达,新闻学会越发达;电视越发达,电视理论会越发达;电脑越普及,电脑传播理论也会随着新的传播现象的出现而产生新的理论。但是,仅仅将新的传播现象当作与其他的现象相独立的“新事物”来考察是不够的。与其瞄着“新事物”,倒不如去发现“先前已有的、但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”。

这不正是卢曼的传播理论给我们的认识所得吗?我们把这种“逆向思维”的技巧看做是能够从卢曼学到的最好的东西。

注释:

① 该文选自樱井芳生所作现代媒介文化论讲座,见 <http://homepage3.nifty.com/sakuraiyoshio/luhmann.htm>. 译文略有删节。参见:田中邦夫主编《テキストによる人文科学入門》(1998)一书中的樱井:《ルーマン—伝言あそびとしての社会》。应作者2010年11月16日给译者来信中的要求,译者特声明该文的著作权为樱井芳生所有,并仅限于本刊本次刊用。

② 尼克拉斯·卢曼(Niklas Luhmann,1927.12.8—1998.11.6)是德国知名社会学家,在社会学、法学、经济学、政治学、传播学诸领域都有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。上世纪70年代,与哈贝马斯的论争引人注目。在社会学领域,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有较大影响,他的媒介观正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。——译者注

③ 伊曼纽尔·沃勒斯坦(Immanuel Wallerstein),1930年生。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,任教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社会学系。著名历史学家,社会学家,国际政治经济学家,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,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创始人。——译者注